

亟待加强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

葛桂霖

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研究,首先属于史的范畴,而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坚实的史料基础决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意义与学术价值。傅斯年强调“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而翦伯赞则强调“史料不等于历史”,即要对史料进行加工制造,这也是问题意识与研究观念或曰史识形成的过程。鲁迅也特别强调“史识”与“史料”的统一,史料需要史识的照亮,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却是研究“入手”的基础。

因而,文献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不仅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同时也意味着学术创新的孕育与发动,其学术价值不容低估。应该说独立的文献准备,是独到的学术创见的基础,充分掌握并严肃运用文献,是每一个文学关系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一般而言,在文史研究领域内,比较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由此推论,衡量一部文学关系研究论著的学术意义,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你给本领域本学科提供了多少新资料、新文献,进而引发多少新问题,展现多少“新的学术眼光”? 20世纪初以来,我们各种新学科群的建立,往往得益于极其重要的新史料的发现及新问题的提出。

当然,新材料的发现带有一定偶然性。研究者们更难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全部寄于新材料的发现上。在新的思路下,有些资料,它会从边缘的、不受重视的角落,变成重要的、中心的资料。于是有些最常见、最一般、最现成的资料,当你用新的观念去阅读时,它便成了新资料,能够给别人提供新的东西,此即钱理群所谓“新的学术眼光”被激活的“新的史料”。

所以,要想构建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的框架脉络,尽可能大量阅读初始

文献史料,感知文学交流场的脉动,这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一个步骤。可以说,只有通过翻阅各种各样的尘封多年的包括书刊、典籍、图片在内的原典材料,才能对文学交流场有所感悟。这种感悟是将各种散落的文学关系史料整合而成历史块状的黏合剂,它最终决定了研究者从史料文献的搜集,生发出关于文学交流观念的可能性及具体程度。所以,文学交流史研究从史料升华为史识的中间环节就是这种“史感”。对我们研究者而言,史感的获得,只有通过初始的文学关系史料的触摸才能养成。它是文学关系史料在研究主体的激活下获得的生命感:以历史沧桑感为基础,同时含有现实感甚至还会有未来感。史料正是在研究者的这种多重感觉中获得了生命。史感与史料是一种互动关系,史料是史感的基础,史感赋予史料以生命。通过两者的有机互动,史料才能真正浸入研究者的主体世界,化为研究者精神主体的有机成分。这种“史感”的获得,是一个长期浸入史料之中,既艰辛又愉悦的过程。这样看来,对史料的翻检与整理并非一种枯燥乏味的苦差事,而是一个重构鲜活历史印迹的生命历程。

因而,呈现中外文学关系史复杂性与丰富性的途径之一,就是要特别重视文献或者史料对文学关系史研究和写作的意义。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开展,成熟与它的“文献学”相关。中外文学关系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仍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尤其是在史料学的建构上,才刚刚起步。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无法跟进,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中外文学关系史学科的“学术性”。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和写作,有时往往受制于研究者的文学交流史观(比如对某个问题域的关注、特定阐释立场的设定),但是,文学关系史显然不是一部纯粹的文学交流观念史。对史料的充分重视和运用,将会改变中外文学关系史写作的基本面貌。关注文学关系史撰著的史学品格,有助于消解某些理论先行带来的历史虚空。

为使中外文学关系领域有可持续拓展的潜力与动力,加强史料学研究实属必要,它是其他专题性研究无法替代的。从史料学的建树来说,哲学、历史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学科走在了前头。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大力借鉴这些学科领域的优秀成果与成功经验,将史料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企求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增添新的内容,树立一种新的标准。

文学关系史料编排与阐释,其目标是尽可能接近或还原中外文学交流历程之面貌,揭示文学交流的历史规律及对现实的启发意义。所以,以原始资料为基础,则成了资料搜集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首要问题。原始性是决定史料真实性的重要因素,而史料的真实性又是决定它的史学文献价值的首要因素。所谓史料是否真实,是想确证这份材料是不是原件?这份材料从史料学上说是不是原始

资料?比如说,某人写的回忆录,单就这份材料而言,当然是原件;但是回忆录是一种事后的回忆资料,详略正常,偏误难免,从展现历史真实性的角度看,则很难称其为原始资料。有时,不经意的记载,或者更进一步说无意的记载,其史料的真实性更值得重视。

这就是说,史料的真实性(是否原件)与它的内容的真实性(历史事件)之间,关系很大。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在于它们是否为原始资料或曰原典性材料,而成为我们叙述那些历史活动的最可靠的凭据。原始资料为什么值得特别重视,就是因为它在史料的原始性,以及反映的主体事实方面有绝对可靠性。

探讨文献史料的真实性,离不开史料具有绝对性与相对性并存的特点。对学术研究来讲,史料的相对性意义更加无法忽视。(1)史料及其所涉及的历史事实的关系,决定了其真实性的程度与效用。(2)史料所展示的历史内容的主体事实与派生事实之间,在真实性方面有差异。(3)史料的学术价值具有可比性,反映同一问题的许多史料中,价值有大有小。(4)课题也体现史料价值。

具体而言,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1)确定文学关系史料的来源,弄清楚历史文献的材料依据和作者写作的具体情况。(2)确定文学关系史料的可靠性,分析史料引用致误原因。(3)明确文学关系史料的价值。(4)对文学关系史料进行分析批评。(5)说明文学关系史料的利用方法。

总之,尝试进行文学关系史料学的研究,可以参照相关学科的史料学著述,确立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一方面总体论述,梳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学关系史料特点,归纳中外文学关系史料研究整理的成就,明确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原则与意义,论证文学关系研究的文献史料价值,总结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史料类型,探讨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的阐释策略。另一方面,分别查考各类文献里的文学交流史料,比如中外史书、中外交通史及古书抄本里的文学关系史料,总集、别集、丛书中的文学关系史料,域外汉籍、佛典道藏、海外汉学著述中的文学关系史料,传记、年谱、日记中的文学关系史料,报纸、刊物中的文学关系史料,工具书、索引、资料汇编中的文学关系史料,等等。另外,尚可对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史料整理与检索,做些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应该说,借助史料,触摸历史,重建现场,展现中外文学交流的原生态面貌,是本领域研究者的一个学术理想。因而,中外文学交流史料的“田野调查工作”实属必要,它对揭示文学交流原生态面貌是不可或缺的。在深厚史料基础上的文学关系史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借此钩沉思想,提炼经验,指导现实,昭示未来。正是学术研究的这种历史纵深,文学交流史的意义才能凸显。